

世界哲學家叢書

李 靚

謝善元 著

傅偉勳 / 韋政通 主編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世界哲學家叢書

李

覲

謝 善 元 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李觀／謝善元著．--初版．--臺北市：
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民80
面；公分，--(世界哲學家
叢書)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19-1220-4 (精裝)
ISBN 957-19-1221-2 (平裝)
1.(宋) 李觀-學識-哲學 2.哲學-
中國-北宋 (960-1126)
125.11 80000903

© 李

觀

著者 謝善元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

編號 E 12067

基本定價 叁元壹角壹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ISBN 957-19-1221-2 (平裝)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劃原先出於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多年來的構想，曾先向政通提出，並希望我們兩人共同負責主編工作。一九八四年二月底，偉勳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三月中旬順道來臺，即與政通拜訪劉先生，在三民書局二樓辦公室商談有關叢書出版的初步計劃。我們十分贊同劉先生的構想，認為此套叢書（預計百冊以上）如能順利完成，當是學術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大創舉與突破，也就當場答應劉先生的誠懇邀請，共同擔任叢書主編。兩人私下也為叢書的計劃討論多次，擬定了「撰稿細則」，以求各書可循的統一規格，尤其在內容上特別要求各書必須包括（1）原哲學思想家的生平；（2）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3）思想傳承與改造；（4）思想特徵及其獨創性；（5）歷史地位；（6）對後世的影響（包括歷代對他的評價），以及（7）思想的現代意義。

作為叢書主編，我們都了解到，以目前極有限的財源、人力與時間，要去完成多達三、四百冊的大規模而齊全的叢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光就人力一點來說，少數教授學者由於個人的某些困難（如筆債太多之類），不克參加；因此我們曾對較有餘力的簽約作者，暗示過繼續邀請他們多撰一兩本書的可能性。遺憾

的是，此刻在政治上整個中國仍然處於「一分為二」的艱苦狀態，加上馬列教條的種種限制，我們不可能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獲得八十位以上海內外的學者精英全力支持，包括臺灣、香港、新加坡、澳洲、美國、西德與加拿大七個地區；難得的是，更包括了日本與大韓民國好多位名流學者加入叢書作者的陣容，增加不少叢書的國際光彩。韓國的國際退溪學會也在定期月刊《退溪學界消息》鄭重推薦叢書兩次，我們藉此機會表示謝意。

原則上，本叢書應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哲學思想家，但是除了財源問題之外也有人才不足的實際困難。就西方哲學來說，一大半作者的專長與興趣都集中在現代哲學部門，反映着我們在近代哲學的專門人才不太充足。再就東方哲學而言，印度哲學部門很難找到適當的專家與作者；至於貫穿整個亞洲思想文化的佛教部門，在中、韓兩國的佛教思想家方面雖有十位左右的作者參加，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方面却仍近乎空白。人才與作者最多的是在儒家思想家這個部門，包括中、韓、日三國的儒學發展在內，最能令人滿意。總之，我們尋找叢書作者所遭遇到的這些困難，對於我們有一學術研究的重要啓示（或不如說是警號）：我們在印度思想、日本佛教以及西方哲學方面至今仍無高度的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早日設法彌補這些方面的人才缺失，以便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相比之下，鄰邦日本一百多年來已造就了東西方哲學幾乎每一部門的專家學者，足資借鏡，有待我們迎頭趕上。

以儒、道、佛三家為主的中國哲學，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本有根基，有待我們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

展，重新提高它在世界哲學應有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時代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比較中國哲學與（包括西方與日、韓、印等東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哲學的優劣長短，從中設法開闢一條合乎未來中國所需求的哲學理路。我們衷心盼望，本叢書將有助於讀者對此時代課題的深切關注與反思，且有助於中外哲學之間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會通。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中國目前雖仍處於「一分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峽兩岸的每一知識份子都應具有「文化中國」的共識共認，為了祖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承擔一份責任，這也是我們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一大旨趣。

傅偉勳 韋政通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自序

《李觀》是我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所寫論文的中譯本。論文完成於一九七二年。七年後，由美國舊金山的中國資料中心出版成書，書名是《李觀之生平與思想》^①（以下簡稱「李著」）。

我本來並未打算要把「李著」譯為中文，可是，經不起一位老友의 慫恿，我終於提起筆來忠實地把「李著」譯完。事情發生在七年前。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到加州柏克萊市去找在加大做研究的陳鼓應教授，告訴他一些我讀他《老子今注今譯》之後的感想，他忽然興沖沖地要我把「李著」譯為中文。他說，大陸的學術界鑒於李觀在中國思想史中有他獨特的見解與地位，已經把他的文集（《直講李先生文集》）用新式標點符號標注好付印^②，你的「李著」正好與這活動配合。經他這麼一說，我忍不住動了心，於是立即動手翻譯。

「李著」中當然有一些可以滿足讀者求知慾的資料。李觀的

① Shan-yuan Hsieh,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Li Kou*, 1009-1059.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1979.

② 《李觀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一年。

主要著作裏以那些最有價值？他對儒家思想有什麼重大貢獻？他為什麼會對法家思想有濃厚興趣？他如何調和這兩家思想？這許多問題都可以在「李著」裏找到答案。

我自己覺得李靚對中國思想史所做的最大貢獻在於區別傳統五德（即仁義禮智信）中的兩大類別，並把其中一類中的四德理出一個次序來。屬於原則性的四德依次為仁、智、義和信，而禮是含蘊這四德而又規範人生中具體行為的條例。

經歷幾百年之後，隨着生產方式及生產關係的改變，規範人的行為的條例當然也必須作適時的調整。可是把所有包含在「禮」這一觀念下的條例全部用「吃人禮教」的罪名拋棄掉，甚至把禮背後的仁智義信原則也一併鏟除，我覺得是太過份了。以人生境界而論，光靠德而不依法，未免太大而無當；可是，處處以法為最後依歸，畢竟還只是中等水平。能夠「依法望德」，似乎才比較理想。

廿世紀卅年代以來，國人最常聽到的道德訓誨是「四維八德」。純粹從學理觀點來分析，四維其實只是二維，即禮和義，因為廉和恥都可含攝在義之下。這一點唐朝的柳宗元早已指出過。八德其實只有三德（即仁信和義），因為仁可攝孝和愛，義可攝忠，而和及平是人在行了德以後所到達的心理境界。

因此嚴格地說，四維八德論不及五德論（而且前者還把智給甩掉了，叫人都不用腦袋瓜想），而五德論經過李靚整理以後，才有一點系統道德論的規模。

即使在今天，我還是認為禮的條目可以修改，禮作為含蘊四大道德觀念的規範人們日常生活中行為的條例總稱，依然有它的社會功能。它是人們在循法之後幫助人們朝更高人生境界邁進的

重要參考資料。

我很欣慰我是《李觀》這書的作者，我希望也相信讀者們會分享我的快樂。

謝 善 元

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

美國加州聖荷西市

導 言

1968年，我決定選宋朝的李觀（1009-1059）作為我論文的中心人物時，已經有好幾位學者對李觀的著作表示過興趣了。胡適恐怕是近代第一位為李觀的思想寫長篇文章的中國學者。他那篇文章定稿於1922年，其中指出李觀與王安石的思想有相通處^①。接著，巴拉徐教授在1933年用德文寫了一篇文章，把李觀——王安石的先驅——介紹給歐洲的讀者^②。日本學者也有對李觀有興趣的，其中至少有三位曾撰寫文章討論過他^③。在這三篇文章裏，最令人拍案叫好的，是本田濟所寫的那篇，因為他曾對李觀的著作做了一番正確的批判和評價^④。

① 胡適，〈記李觀的學說〉，見胡適，《胡適文存》二集，卷2，頁35-39。這篇文章原先刊於《努力週報讀書雜誌》1922年版。

② 見巴拉徐，《中國的文明與官僚體制》，頁277-289。

③ 他們是諸橋徹次，《儒學的目的與宋儒的活動》，頁273-293。本田濟，〈關於李觀〉，見《石濱先生古稀紀念東洋學論叢》，頁506-517。麓保孝，《北宋期間儒學之開展》，頁91-100。

④ 本田濟說，李觀對禮的了解是很精闢的；他的《禮論》是他後期思想的基礎。這兩點評論都很正確。

可是前述諸君都不曾爲李觀的生平和思想做一番徹底的研究。有鑒於此，我於是決定分析他的整部文集^⑤，而分析的結果，是出版了本書。

我在寫書時所用的研究方法、步驟，以及術語，都是因襲常規的^⑥。第一章交代了宋朝開國以後七十年間的社會概況，以便讀者能了解，李觀是在什麼樣的一個環境中出生以及長大的。第二章勾描出李觀的生平大事。

第三章順着年代討論了李觀的重要作品。我不但推斷了各種著作的殺青年月，介紹了它們的主要內容，也討論了它們在李觀一生寫作中的意義與份量。

第四至第六章是全書的精華所在。我在這裏用三種不同的角度來察看李觀的各種觀點。第四章交代了李觀對各種政治問題的看法並把這些看法和先秦諸子的哲學作了比較。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李觀自稱他曾熟讀過中國先哲的書。把兩者相比可以讓我們了解李觀到底從他們那裏承襲了多少思想。由於我沒法找到一個現成而又合乎我需要的參考間架，因此我就特地爲這一章建立了這麼一個間架。我在建架過程中閱讀了《論語》、《孟子》、《荀子》、《商君書》，以及《韓非子》，因為這些書是李觀政

⑤ 我當初寫論文時所用的資料是《四部叢刊》的《李直講文集》。現在爲了讀者閱讀翻查的方便，所有引用到的出處，都以《李觀集》爲主。

⑥ 所謂「因襲常規」的意思，是說我沒有標新立異地創出一套術語來作爲分析李觀思想的工具。我所用的名詞，爲「政治」、「經濟」、「社會」等等，都是常用的名詞。

治思想的主要來源^⑦。第五章探討了李觀對儒家哲學系統所作的貢獻。第六章審視了他對當時社會上各種問題的批評。我在這一章裏所用的小標題，諸如政治、軍事、經濟、財政，以及社會等等，都是常用的類詞。不過這些類別似乎挺管用的。另一方面，這些類別幫助我對李觀與王安石之間的政治思想所作的比較。這一個比較是第七章的主要課題^⑧。

至少有兩位學者曾聲稱李觀是王安石的先驅^⑨。可惜他們不曾細細比較李王之間思想的異同。其次，至今還無人能斷定是否李王兩人曾經邂逅相識^⑩。本書第七章為李王兩人的思想作了一個有系統的比較（我所用的類別，就是原來分析李觀生平與思想時所用的類別），同時衡量了介紹他們兩人相會或相識的幾種可能情形。我的結論是：李觀曾對儒家的哲學思想起了提昇和精

⑦ 李觀從《周禮》那兒獲得許多靈感。這是他對宋朝許多制度提出不同建議來的依據。跟西漢的劉歆（卒於23）和東漢的鄭玄（127-200）一樣，李觀相信《周禮》一書出自周公旦的手筆。見《李觀集》頁67。不過，近代有幾位學者卻支持何休（129-182）的年代推算法。他們認為《周禮》一書可能寫定或編定於戰國時代。見顧立雅《中國治國術的起源》，頁479。我個人同意顧立雅教授以及近代學者的結論。我相信先秦諸子的哲學，從年代上說，是先於《周禮》出現的。在本書內，只要情況許可，我會把李觀引用先秦諸子及《周禮》時的出處指點明白。

⑧ 我在第六章裏比較了李觀對宋朝各項問題所提出的解決辦法，以及與他同時的當代諸賢的看法。

⑨ 見胡適，前引書，頁35；巴拉徐，前引書，頁277。

⑩ 當然，人與人之間是否曾謀面相識並不是意見承襲的先決條件。

鍊作用，而王安石沒有。可是王安石對儒家和法家^①思想的了解並不比李覲差。作為時政的批評者，李王兩人是「不相伯仲」的。然而他們的政治命運卻大異其趣。李覲一直沒有機會擔任政府公職。晚年雖然撈到一官半職，這職位也低微得可憐；反觀王安石，卻有得君寵、施抱負的千載難逢良機。我無法確定李王兩人是否曾相見相識，可是我深信，他們兩人彼此都知道對方的存在，而他們之所以能相識，是因為他們兩人有共同的朋友——祖無擇。

本書的主題是一位北宋學者的生平與政治思想，可是，書裏也觸及一些理論性的問題。這些我在結論章有點交代。

不消說，宋代思潮裏有其他許多層面可能與李覲的政治思想有關。第一個名正言順的問題是：李覲與宋朝幾位知名的理學家之間有何淵源或連繫？我的印象是：李覲很少涉及形而上學的問題^②。他和當時的幾位知名的理學家諸如邵雍（1011-1077）、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程顥（1031-1085）或程頤（1033-1107）似乎沒有來往。李覲在飽受儒家思想薰陶的那段時期裏，並沒有跳出當時儒學傳統的範疇。他的主要與

① 通常我們用「法家」這名詞時，會把重心放在由商鞅所主倡的刑法上，從而忽略了申不害所強調的行政控制技巧。見顧立雅，《何謂道家？》頁92-120。讀者若想知道申不害生平及思想的詳情，請看顧立雅，《申不害——中國公元前四世紀的政治哲學家》。我對「法家」這一名詞命名上的缺陷很瞭解。可是，我在本書中依然沿用了這名詞，因為我找不到一個更恰當的代用詞。

② 這句話有個例外情形。在《易論》裏，李覲確曾討論到一些形而上學的論點。不過那些玄學上的討論似乎並不很系統化。見本書，頁56。

趣顯然只在於與宋朝當時政治問題有關的那些思想命題。在這方面，他和王安石是極類似的。兩者都是從實用觀點取向的。

我在寫書過程中所用的資料當然是不完整的。不過我已經盡力好好選擇——選擇那些能夠代表中國思想主流及能代表宋朝歷史背景的資料。如前所述，我用了先秦諸子中五子的著作，《周禮》以及李覯、王安石、韓愈（768-824），和柳宗元（773-819）的文集。有關宋朝開國以後五十年內的大事，我用的材料主要來自陳均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以及李燾的《皇宋十朝綱要》。1009至1041年間的歷史材料，大部份採自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與李覯同時期的許多其他北宋人物的文集，當然可能會幫助我們了解十一世紀上半葉的社會與政治情況。可是，爲了使我的研究易於掌握，我決定不涉及它們。

李 觀 目 次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自 序

導 言

第一章	歷史背景	1
第二章	李觀傳	17
第三章	李觀的著作	51
第四章	折衷持論的政治思想家	71
第五章	傳統儒家政治理論的精鍊者	95
第六章	社會批評家	113
第七章	李觀與王安石	141
結 論		181
年 表		189
參考書目		201
索 引		205

第一章 歷史背景

人的思想和行為雖然不至於會被他所處環境完全支配，通常會受到它強烈影響。李觀也不例外。

李觀生於1009年，正值眞宗（宋朝第三任皇帝）當政（眞宗在位期自998-1023）。那時宋朝開國期間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多半已經迎刃而解。整個國家於979年完全統一。透過一連串機警精明的策略和佈署，太祖（於960-976之間在位）及太宗（於976-998在位）已經把中央政府的權力與威信建立起來^①。有威望的軍事將領們在961年就被紛紛解除軍權^②，將領與士兵經常地被調防，這樣就達到兵不專將，將不專兵的結果。中央又派通判到各地去分節度使和知州的權^③，同時不讓知州管財政或司法^④。只要情況許可，中央會派文人去接管軍人的行政工作^⑤。地方上的叛亂也迅即敕平^⑥。

宋朝與鄰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在眞宗時也進入一個新的境界。邊區已沒有戰事。宋與北鄰遼國（907-1123）之間曾於979年開戰。986年，宋軍屢被打退，可是隨後八年內雙方互有勝負。宋遼之間的戰爭終於在1004年隨着澶淵之盟而告一段落^⑦。遼主答應尊宋帝爲兄，宋則每年給遼歲幣，計絹二十萬匹，銀十

萬兩^⑧。此外，西夏李繼遷^⑨連續二十年的進擾，也因他的死亡而於1004年告終^⑩。

另一方面，幾乎年年都氾濫^⑪的黃河，進入十一世紀後，似乎已被控制住。爲了使開墾土地的事能更有效率，轉運使及知州常常兼任勸農使^⑫。由此看來，1004年以後宋朝財政收入逐年增加^⑬可說是事非偶然。1010年及1012年，稻穀豐收，糧價大幅下降^⑭。

因此李覲出生時正值和平豐裕年頭。在他廿五歲以前，宋朝不曾與其他國家開過戰。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宋朝社會是欣欣向榮的。

一、宋朝社會的光明面

宋真宗是一個頗有良心的皇帝^⑮。他自知光靠他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持國^⑯，因此他焦急地找人輔助^⑰。如果他找到可靠的大臣，他會信任他們，並把國家交給他們治理。譬如說王旦就曾被真宗授權處理朝中一般政務，不需要事先得真宗同意。這一種做法曾嚇壞了許多在朝裏服務的高官。他們壓根兒沒想到皇帝與大臣之間能互相信任到這種地步^⑱。真宗自己又想到要改良當時的考試制度。從1012年起，他屢次下詔要負責考試的官員在錄取進士時，把考試的重心放在趕考人的策論上，而不放在詩賦上^⑲。另外，爲了要提醒他自己，「農夫耕田是很辛苦的」，他命令屬下在禁城的花園裏種稻^⑳。他阻止各地把珍禽異獸獻到宮中去^㉑，禁止皇室人員佩帶奢侈的衣物^㉒。1015年，他把一百八十四名宮女自宮中放回民間^㉓——這一方面是基於人道上的顧